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13 届年会综述

何东霞 柴 盈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13 届年会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在广东商学院召开,会议由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此次年会主题为“转型与发展”。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实质

1.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王小广研究员分析了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表现在增长偏快、需求不足,政策不紧、扭曲明显,通胀见顶、房市将调,趋势下行、过剩危机。西安文理学院刘鸿明提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由起飞向成熟阶段迈进,在生产方面是新的领导部门取代起飞期旧领导部门的阶段,也是各种生产资源从低效利用的行业和部门转移到高效利用的行业和部门的阶段,同时,经济增长赖以展开的资源约束条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将认为,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讲,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湖北工业大学徐彬和彭贤则认为,经济转型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我国转型和发展的收益被快速分享,成本被分担,同时也出现成果分享不均和成本分摊不合理的现象。首都师范大学毛强指出,中国人均 GDP 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承担在新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发展重任,必须深入总结和吸取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南开大学姜磊提出二元转型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系统论述了劳动收入份额随二元转型程度的“U”型变动规律,随着二元经济的发展,工资效应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则逐渐减弱,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态势,最为根本的还是要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型。

2. 资源环境问题。广东商学院梁妍和凌晓清研究了发达国家新型环境性贸易壁垒与出口贸易低碳化发展,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利益博弈的新领域,发达国家以减缓气候变暖为名构筑碳减排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等新型环境贸易壁垒,给我国企业在出口成本提高、市场份额下降、出口环境恶化等方面造成严重冲击。广东商学院胡根华和秦嗣的研究表明,“金砖国家”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水平不高,而中国能源效率最低,其节能潜力很大,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 民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牛楠和叶裕民认为,五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带来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不同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有一定差异,收入因素对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影响并不明显,就业状况、住房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是影响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最重要原因。天津财经大学马国旺和谭啸认为,“用工荒”只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趋势的一个表征,近年来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呈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等。北京师范大学方晓萍创新性地从单位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构建反映国

民幸福程度的指标,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在缓慢提高,但随经济运行状况而有所起伏。各省、市国民幸福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状况基本吻合,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稍有出入,她认为我国发展的转型当从“藏富于国”向“还利于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转变。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方向

1. 经济发展与转型绩效的评价标准。南开大学张仁德提出评价社会经济体制的绩效和经济体制创新与改革的标准应该为生产力和幸福度“双标准”。他指出人们过去一般拿生产力作为最终评价标准,近年来,许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倾向于把“民生”或“幸福指数”作为最终标准,这两种观点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应采用生产力和幸福度“双标准”作为评价经济体制合理与否的主要指针。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和王俊进一步提出,只有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2. 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领域。南开大学何自力着重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他批判了西方高级产业结构产生的失业、经济增长停滞和竞争力下降后果,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应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悲剧,而应另辟蹊径。武汉大学邹薇、魏福成和马文涛提出,持续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是一国摆脱贫穷的关键,他们提出,在以下几种情形下,产业升级会降低政府税收收益和经营中间品的利益集团的利润,从而会阻止产业升级:(1)产业升级导致的(人力或物质)资本份额的上升幅度较大,或者技术进步的幅度较小;(2)初始产业状态中的资本份额足够大;(3)企业家购买资本的价格较高,或者利益集团经营的中间品的生产率较低;(4)政府从征税中获得或留存的税收比例(或腐败租金)较大;他们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缓慢甚至停滞、“二元化”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等经验事实,提供了一个理论解

释。同时,中国的财政分权会强化“地方政府的税收最大化的动机”或使得“地方政府更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因而会阻碍产业升级和转型,也为中国的财政分权的弊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些参会代表特别论述了城市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天津师范大学胡钧浪和吕景春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应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协调的原则,消除限制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积极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努力创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3. 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模式。南昌大学罗海平认为,中国的转型或转轨本质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即市场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转型和发展模式的硬核,是最根本的现实基础,具有不可辩驳性。而国防大学于连坤认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方向应该从如下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研究,切实搞清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统一体的确切内涵和外延,搞清经济发展方式同经济增长方式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二是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性质定位的研究,进一步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解决生产力落后问题,还要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不仅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重大举措。三是深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策思路的研究,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虽然是个经济问题,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创新与改革,需要具有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高度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意识和视野。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建青)